

《东都事略》与《宋史》 比较研究

舒仁辉 著



商務印書館

《东都事略》与《宋史》比较研究

舒仁辉 著

商務印書館

200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都事略》与《宋史》比较研究/舒仁辉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

ISBN 7-100-04569-X

I. 东… II. 舒… III. 东都事略—对比研究—宋史 IV. K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 第 16382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东都事略》与《宋史》比较研究

舒仁辉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4569-X/K·869

2007年1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0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9 1/4

定价: 18.00 元

自序

北宋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朝代。在北宋 168 年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也曾遭遇过内忧外患的历史磨难。对这么一个重要朝代进行历史的考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是很有必要的,更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研究北宋这个历史内容相当丰富而又充满各种矛盾的朝代,除了要有高度的历史眼光,还需获得足够的、准确的历史材料。宋代发达的文化事业,留给我们的历史材料丰富而相对完备,这是弥足珍贵的。但是大量的原始资料,使我们既为其丰富而感到满足,又因其本身存在许多无法回避的内容问题而苦恼。宋史的资料,因为政治斗争和流传过程中的种种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不可相信的成分以及或多或少的错误,这些问题无疑犹如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荆棘之林,给宋史理论研究的提高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因此,对宋史史料书开展研究,本身就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其重要性显然不言而喻。长期以来,广大的史学工作者持之以恒,在宋史资料的研究领域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宋史资料存在的牴牾和错误实在太多,虽然前人已经做过不少的工作,但仍然有必要继续进行。

作为宋史基本史料书之一的《东都事略》,是纪传体北宋史,学术界长期以来注重用它用来考订《宋史》、《长编》等著作,对此书本身研究不足;而对《宋史》而言,研究成果虽然很多,但因其中存在的问题实在太多,在现有的基础上,仍然有较大的研究余地。本书的完成,就是在这

个领域做了小小的尝试,但愿可以对这两部书的史料运用和评价有所补益,如能对宋代史料的研究工作略有推进,得出一些更符情理的认识,作者也就为此感到满足。

本书主要采取比较的方法,对《东都事略》和《宋史》的编纂体例、记载的内容、编纂者的思想进行比较,对其内容辨别异同,进行简要的考订,以期对宋史的研究尽一点绵薄之力。因为《东都事略》成书于南宋,只有纪传;而《宋史》成书于元末,包纳两宋,纪表志传俱全,所以对二书的比较只能大致以《东都事略》所记载到的内容作为基本范围。考虑到《东都事略》的附录涉及辽、金历史,故也将相应部分与《辽史》、《金史》作一简单比较。因为《宋史》以中华书局标点本和《东都事略》的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较为通行,故以标点本《宋史》和文海本《东都事略》参校,同时参考了文渊阁本《东都事略》。

纪传体史书有其自身的特点,如本纪中有联书,传文中有省文,还有在记事中的文字通用、概念大小等种种情况,这些都是不容掩盖的事实。但是,本书作者的理解是,作为基础研究还是应该尽量把历史的内容搞得更清楚一些、细致一些,精细的研究总比粗放要扎实一些,体例和内容不是等同的概念。我们知道本纪有联书,不等于就清楚其中到底采用的是哪件事情的时间;知道从弟、内弟、亲弟均系弟也,但并不等于清楚究属何种具体关系。汉字中的通假现象也并不都适用于固有的历史专用名词。历史学科的目标之一就是应该尽量展示其原貌,而不是用宽泛的理解去掩盖更加精密的论断。近年来有不少人士在历史研究中不大注意逻辑问题和对历史考证学传统的继承,从粗泛的角度辩驳精确的考释,这是本书作者所不赞同的。

本书系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当初选择这么一个课题,除了考虑到这两部书的重要性之外,更主要的考虑就是通过对史料原著的摸索,更好地掌握和理解宋史资料,为今后的宋史研究打下一定的

基础。历史学科本身是讲究求实存真的,历史研究必须建立在史实的基础之上,脱离史实发表的空论经不起这门学科的检验。前人在长期的学术研究过程中总结和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依然值得我们今天的学者们借鉴和学习。采用什么样的方法,确定多大的研究范围,评价研究工作意义,都不应该脱离前人的经验来加以确定。尊重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学习别人的研究方法,避免忽视基础工作而重蹈覆车之辙,是本书作者所愿望和追求的目标。

在写作过程中,承蒙导师徐规先生悉心指导和修改,在毕业论文送审和答辩过程中,得到许多著名专家的批评指正。对于这些宝贵意见,修改成书之际,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吸收,在此,谨对曾经仔细审读过拙文的先生们一并深表诚挚的谢意!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杭州师范学院科研处、人文学院的领导和同仁的大力支持。本书之所以能够顺利面世,更要感谢商务印书馆的领导的鼎力帮助。由于作者水平有限,闻见未广,书中存在不足之处有所难免,恳请学术界广大有识之士不吝赐教。

目 录

自序·····	1
---------	---

上 篇

第一章 《东都事略》、《宋史》的研究现状 ·····	1
一、《东都事略》研究状况 ·····	1
二、《宋史》研究状况 ·····	5
第二章 《东都事略》、《宋史》之编纂·····	17
一、《东都事略》的作者及其生平·····	17
二、《东都事略》的两个主要版本·····	23
三、《宋史》的编纂经过·····	29
四、《宋史》的版本·····	31
第三章 《东都事略》、《宋史》之体例·····	35
一、《东都事略》体例评述·····	35
二、《宋史》体例评述·····	41
第四章 《东都事略》、《宋史》之记事·····	45
一、《东都事略》的记事特点·····	45
二、《东都事略》的史料来源和价值·····	54
三、《宋史》记事的几个问题·····	56
四、《宋史》的史料来源和史料价值·····	62
第五章 《东都事略》、《宋史》之史论·····	66

2 《东都事略》与《宋史》比较研究

一、王称的史学思想	66
二、《宋史》的史论	80
三、《东都事略》、《宋史》思想的异同	95

下 篇

第六章 《东都事略》、《宋史》所载史实考	99
一、《东都事略》本纪与《宋史》本纪考异	99
二、《东都事略》世家与《宋史》列传考异	155
三、《东都事略》列传与《宋史》列传考异	166
四、《宋史》、《东都事略》所载人物卒年比较	279
五、《东都事略》附录与《辽史》、《金史》考异	281
附录一 张叔夜死节地点考释	285
附录二 《〈宋史·本纪〉考证》正补	289
附录三 “止其致仕”解	301
参考文献	304

上 篇

第一章 《东都事略》、《宋史》的研究现状

北宋历史,在《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东都事略》、《三朝北盟会编》等史书中都有珍贵的记载,诸书的史料价值均不容忽视。其中以纪传体形式出现的,只有成书于南宋孝宗时的《东都事略》和修成于元朝时期的《宋史》。《东都事略》虽称为“事略”,却是一部内容丰富、直接取材于宋代史料的原著,是了解和研治北宋历史不可缺少的佳作。因为《宋史》属于隔代修史,所以《东都事略》具有独特价值,尤其是有许多内容只在这部书中有所记载,与宋代官方国史和实录有着密切的渊源,又是解开宋代官修史书体系内容、探讨史源的重要依据,其文献价值曾得到清代学者的高度肯定。《宋史》在二十四史中卷帙最多,内容丰富,体例完整,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在本书开始探讨这两部重要史著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对这两部书的研究现状作一简单回顾。

一、《东都事略》研究状况

《东都事略》作为南宋人所编著的北宋史,距北宋灭亡不远,成书的时间应该略早于淳熙十三年(1186),即作者在知龙州时所上该书于朝廷的时间。《宋史》则完成于宋亡很久以后的元朝末帝顺帝的至正五年(1345),两书的编成前后相差约160年。尽管这两部书都是研究宋朝历史的重要著作,但相对于《宋史》研究而言,学术界对《东都事略》的研

2 《东都事略》与《宋史》比较研究

究尚非常欠缺。一般说来,大都是将它作为校勘《宋史》等史籍的参考资料,而对其本身的内容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尚属阙如。即使略有涉及,也主要是一些简单、零星的评论或考订。

在南宋时,人们已经开始对这部史书有所关注,留下一些零星的考证或评述,但基本上是批评性的。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四《续资治通鉴长编》条云:

然其书(指《东都事略》)特掇取《五朝史传》及《四朝实录附传》,而微以野史附益之,尤疏驳。

今本《旧闻证误》尚有李心传对《东都事略》的辨正2条,该书卷二云:

诏议濮王典礼,王珪与礼官合奏,王宜称皇伯,三夫人当封大国,执政不以为然。其后,三夫人卒如珪议。阙书名出王偁《东都事略》按,《史》,三夫人未尝加封,故李邦直熙宁八年撰《韩魏公行状》曰:“英宗所生,迄今为仙游县君。”识者皆疑其非礼,意元丰二年五月,始诏三夫人并称曰王夫人,迁祔濮园,未尝封大国也。李邦直撰《禹玉神道碑》亦云:“治平中,议追赠濮王,公执用封期亲尊属故事,执政以为不然,公持之,卒不夺。其后谏官、御史争论,久不决,帝以手诏裁定,多如其初。”邦直所云,但指不称皇耳,此谓三夫人卒如珪议者,实甚误。

同书卷三又云:

宣和元年九月乙卯,范致虚以母忧罢。阙书名出王偁《东都事略》按谦叔去位在八月癸卯。

王明清在《挥麈后录》卷二(第133条)详细载录了北宋徽宗朝关于艮岳的诗文,该书并说:

近王(偁)[称]作《东都事略》,载蜀僧祖秀所述《游华阳宫记》,不若是(指《后录》)所记载徽宗御记、李质和曹组的赋与诗、翰林学

士王安中“登丰乐楼望而赋诗”等)之备也。

在这里,王明清旨在表述自己的载述完备,也指出了《东都事略》的记载不十分完备。该书卷六(第212条)又对《东都事略》的一处记载进行了辨误,云:

李端叔之仪,赵郡人,以才学闻于世。……王(偁)[称]《东都事略》云,端叔姑苏人,非也。

岳珂在《桯史》卷七“嘉禾篇”中指出《东都事略》的记载存在失误,他说:

王称作《东都事略》,载张[商英]罢左丞,以言蔡京奸邪,有“自为相国,志在逢君”等语,台臣以非所宜言而谪之。考之史谍,盖专坐此篇(注:指张商英在元祐年间所作之《嘉禾颂》诗),称书误甚。当因其异同之迹,而遂从传疑,其实非也。

在李心传、王明清、岳珂等人看来,《东都事略》存在或多或少内容方面的疏漏和错误。

朱熹对《东都事略》也提出过一些批评性的意见,他的评论则是从记事取舍这个方面出发的。《朱子语类》卷一三〇《自熙宁至靖康用人》载:

先生(注:指朱熹)看《东都事略》,文蔚问曰:“此文字如何?”曰:“只是说得个影子。适间偶看《陈无已传》,他的好处都不载。”问曰:“他好处是甚事?”曰:“他最好是不见章子厚,不着赵挺之绵袄,傅钦之闻其贫甚,怀银子见他,欲以贖之;坐间,听他议论,遂不敢出银子。如此等事,他都不载。如《黄鲁直传》,鲁直亦自有好处,亦不曾载得。”文蔚问:“鲁直好在甚处?”曰:“他亦孝友。”

在朱熹看来,《东都事略》没有把一些他认为应该记载的内容记载进去。

赵希弁也认为《东都事略》“疏驳”(《郡斋读书志》卷五上《附志》),

陈振孙同样认为“其所纪太简略，未得为全善”。（《直斋书录解題》卷四《东都事略》）

由此可见，在南宋人的眼里，《东都事略》一书存在着内容疏漏和取材不够全面等问题，对它评价不高。但是，从元修《宋史》开始，《东都事略》便被当成可供参考的一部北宋史著作。特别是在《宋史》问世之后，人们发现《宋史》中存在大量的史实错误和疏漏，便把《东都事略》作为考订《宋史》的重要参考书。这是因为，该书是南宋人编写的惟一的一部纪传完备的北宋史，其记事多采自宋朝的官方著述和私人文献，其内容又有为《宋史》所忽略者。该书的《附录》部分，还可与《辽史》、《金史》的记载对勘。因此，人们对《东都事略》价值的肯定，大大超出南宋人的认识。清朝四库馆臣所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该书的提要中对这部书的评价很高，将它和《长编》、《要录》相提并论，说：

宋人私史卓然可传者，惟偶与李燾、李心传之书而三，固宜为考宋史者所宝贵矣。

元修《宋史》，虽未充分参考《东都事略》的内容，但对这部书的体例和史论有所取鉴。其中，直接采用了《东都事略》的评论一则，即《宋史》卷三一五《论》引《东都事略》卷五八《韩亿传论》。《宋史》卷四七八又称不用《东都事略》及旧有国史置孟昶、刘鋹等八国之君于列传的做法，而仿欧阳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列为世家。《宋史》虽未采用《东都事略》的做法，但是在经过斟酌之后才做出决定的。不过今本《宋史》的《世家》实即列传之一部分。清代学者钱大昕在考订《宋史》的过程中，曾多次引用《东都事略》的材料。中华书局点校本《宋史》也据《东都事略》来考证《宋史》中的错误，《宋史》的校勘记吸收了《东都事略》的不少正确内容作为其中的证据。

就讨论该书作者、体例、内容的文章来说，目前见到的有陈述的《东都事略撰人王赏称父子》（《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分，1939年10

月)、蔡崇榜的《宋代四川史学家王称与〈东都事略〉》(《成都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何忠礼的《王称和他的〈东都事略〉》(载《陈乐素教授九十诞辰纪念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等。

对《东都事略》的内容进行考订的,有清末元和人钱绮所著《东都事略校勘记》、江阴人缪荃孙的《东都事略校记》,二者均有《适园丛书》本,台湾文海出版社1979年影印《东都事略》附有此二文。钱绮和缪荃孙的考订,有助于我们对《东都事略》的版本和内容的了解,有重要参考价值。

钱绮的校勘以清朝大约刻于康熙年间翻刻本为底本,校以此本的初刻本、旧钞本以及从余子畲处借到的每行25字本。缪荃孙以其辛未年在隆福寺书肆所获一旧钞9行20字本与眉山程舍人本对校,发现该本与程本的面貌有所区别,表现在于:

目录编次不同,《后妃传》李宸妃、郭后、高后均不同,又脱沈贵妃一传,加減字均属有意,《王安石传·赞》易其半,苏辙、孔文仲传赞后有考异一篇,是程本在先而此本改削增补处善于程本。

综上所述,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东都事略》这部书,仍基本上把它作为史料加以使用。就考订而言,钱绮和缪荃孙的校勘对《东都事略》的校勘贡献最大,但也只停留在本书各版本之间的对校,没有采用《四库全书》本这一未经清人剽改的版本进行比较,更没有采用以《宋史》和它进行全面对比的方法加以研究,因而遗留的尚待考订的内容问题尚属不少。更为遗憾的是,《东都事略》这么一部以宋国史、实录史料为基础编写的重要著作,虽被岳麓书社新版的《二十五史别史》丛书本收入,但尚无校正本问世。

二、《宋史》研究状况

《宋史》作为一部囊括两宋历史的纪传体正史,长期以来,史学界对

它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宋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 综合评述。周生春在《中国史学名著评介》(仓修良先生主编)第二卷《宋史》篇概括了《宋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重要人物失载;南渡诸传不备;重京朝、轻地方;一人两传;一事数见;次序颠倒;彼此矛盾;编次之误;义例不一。该文所举实例,几乎吸收了赵翼、钱大昕等人的成果。此类综合评述,在一般性的史籍介绍中大都有所涉及。同一作者还撰有《关于辽、金、宋三史编撰的几个问题》〔载《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一辑)〕,对三史的编纂过程中的组织分工、编修地点及所费时间、修史官员人数等进行了考释,提出了新的见解。

2. 内容考订。《宋史》错误繁多,这几乎是一个共识。清人李慈铭在《宋史札记》(见《二十五史三编》)中指出:“诸史莫劣于宋。”今人戴裔焯在《宋代钞盐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第1版)附录《宋史食货志盐法正误》一文中也强调说:

《四库提要》极推崇沈世伯所撰《宋史就正编》,说他举出《宋史》纪传互异、志传互异及传文前后互异者多条,然《宋史》的错误,多如牛毛,难以一一具举。

正因为《宋史》的错误太多,学者们研究《宋史》的成果,绝大多数是校正其错误的。清代学者在考订《宋史》内容方面贡献突出,成就最大的数赵翼和钱大昕二人。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以下简称《札记》)和《陔余丛考》(以下简称《丛考》)、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以下简称《考异》)和《十驾斋养新录》(以下简称《养新录》),都有很多这方面的内容。《札记》卷二三至卷二六考订并论述《宋史》的体例、内容以及宋代史实,卷二七的《宋史金人名多与金史不符》、《宋金二史不符处》、《宗弼渡江宋金二史互异》、《宋金二史传闻之误》、《宋金用兵须参观二史》等条目则通过对《宋史》、《金史》的比较来阐述二史的互异及其成因。其《丛考》的

卷一三除阐述《宋史》八则之外,尚有《宋辽金三史》、《辽宋二史相合处》、《辽宋二史不相合处》、《宋金二史不相合处》、《宋辽金史旧本》等与《宋史》有关的内容,此外,卷一八有九则内容、卷二〇有八则内容与《宋史》或宋代史实有关。赵翼所采用的《宋史》是明朝的南北国子监的二种版本。他最大的特点就是进行比较和归纳,在对《宋史》、《辽史》、《金史》三史互校后发现了不少问题,对《宋史》本身内容前后比较中也发现了不少问题,然后进行较为全面的论述。

赵翼指出:《宋史》的材料主要是宋朝史馆的官方材料,度宗以后的内容则为元朝史官所收集的。《宋史》的重修有修成的,也有未修成的,但都不算成功。《宋史》记事最详,其原因主要是宋代官方记录详细、私家著述繁多:

自是宋代史事较为详慎,有一帝必有一帝日历,日历之外又有实录,实录之外又有正史,足见其记载之备也。……其士大夫所著,尚有不可胜数者。(《札记》卷二三《宋史事最详》)

赵翼认为在取材方面,《宋史》多国史原本,但也有增入处。如《牛皋传》后总叙岳飞之功,系旧史牛皋附于岳飞传之后,而元修《宋史》将岳、牛二传分开又未将传末总叙岳飞之功移至岳飞传后所致。旧史叶梦得入于列传,《宋史》入于《文苑》,但未增入其能文之处,故其《石林燕语》、《避暑录话》之类于本传不载。而《唐恪传》(实为《李邦彦传》)后之余深、薛昂、吴敏、王安中、赵野等传系旧史所无而增入者。旧史张凝、李重贵二人附于《康保裔传》后,《宋史》另为二人立传。刘锐、赵汝彘二传亦为元人增入。

他还指出《宋史》存在大量的问题,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1)是非不公。赵翼说:

元修《宋史》,度宗以前多本之宋朝国史,而宋国史又多据各家事状碑铭编缀成篇,故是非有不可尽信者。……有功必详著之,则

功绩未必果出于是人，而苟有相涉者，亦必曲为牵合。

他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

盖宋人之家传、表志、行状及言行录、笔谈、遗事之类，流传于世者甚多，皆子弟门生所以标榜其父师者，自必扬其善而讳其恶，遇有功处辄牵就以分其美，有罪则隐约其词以避之。宋史修国史即据以立传，元人修史又不暇参互考证，而悉仍其旧，毋怪乎是非失当也。（《札记》卷二三《宋史各传回护处》）

针对此类问题，他举例加以说明：靖康围城之时，姚平仲劫敌营失败，李纲实主其计，而据李纲本人《靖康传信录》立传的《李纲传》，其记载却似纲初不知此事；吕好问从张邦昌，为南宋朝廷一等罪人，而《吕好问传》不载其从逆之事，反备载其谏张邦昌即位及促邦昌迎高宗等事；一代名将韩世忠年少粗豪，曾有欲与刘光世交兵、部下逼逐谏臣坠水死、刃伤弓匠等事，而其本传均不载；张浚尝劾李纲以私意杀侍从宋齐愈、荐秦桧可任大事、奏胡绳笔削陈东书、尝奏岳飞意在并兵、与秦桧援郊祀恩起汪伯彦知宣州等事，本传中一概不载，惟杀曲端一事略见传中，但从传中看又似非枉杀者；而赵良嗣不应入《奸臣传》，王伦非小人。另外，诸如叶梦得、刘一止、何铸、李显忠、岳珂、史迹远、贾涉、郑清之、赵范、赵葵等传中均有是非问题。

（2）附会功劳。如徐河之捷，便是典型的例证：

是[尹]继伦之突击，并未与[李]继隆同列阵也，而《继隆传》云与继隆列阵以待，此不过欲著继隆之同功耳。（同上）

他还指出：徽宗传位于钦宗，其意本出徽宗，而从《李纲传》看来，传位之意却似本出李纲。又《李纲传》和《张浚传》分别记载平定湖、湘诸寇之功于二人，抹杀其他将帅如韩世忠（平刘忠）、岳飞（平曹成、杨么）等战功，且《纲传》不及浚、《浚传》不及纲。伪齐之废，本因刘豫攻宋不能取地，且多次向金人请兵，可《岳飞传》、《张浚传》却分别系功于二人

之两封蜡丸书之反间,《王伦传》又以废豫之功于王伦之出使。采石之战,与李显忠无关,而《李显忠传》谓因趣显忠交军故有此捷,似功出于显忠。又传中谓显忠遣万人渡江,尽复淮西州郡,完颜亮因此切责诸将,以至被弑,亦非史实。《贾涉传》将李全之功归于贾涉。

(3)数人共事,传各专功。如:贝州王则之乱,明镐、文彦博等讨平之,《郑骧传》云“王则反,讨平之,竟似骧一人之功矣”,而《杨燧传》、《刘闾传》皆谓功第一;夏竦卒,赐谥文庄,司马光、刘敞俱驳之,而二人传中所记竟似各自一人所驳所改。

(4)传中错谬。《袁彦传》、《张保续传》均有刘仁贍出降之语,实则刘并未降,欧阳修《新五代史》已辨明并列之于《死节传》中,《宋史》却沿袭了《旧五代史》的错误;《韩世忠传》中所记伏兵金山,应为伏兵北固山等。

(5)列传遗漏。如,极谏徽宗不可赴金军的姜尧臣、忠义之士彭义斌、作《新唐书纠缪》的吴缜、南宋文学大家刘克庄都是重要人物,而《宋史》均未立传。

(6)排次失当。如,五代人物李穀、李涛不必在《宋史》中立传,南宋人刘子羽、胡世将、郭浩、杨政等人应附于吴玠、吴玠传后,解元、成闵应该附韩世忠传之后,王次翁、陈自强应各自附于秦桧、韩侂胄传之后,权邦彦不应置于宁宗诸臣之列,汪若海、张运、柳约不应置于理宗诸臣之列,林勋、刘才邵不应置于德祐末造李廷芝诸人之列,而僭伪诸国之臣有的人于世家有的却立专传,“此皆自乱其例者”。

(7)立传重复。卷一一六有《李熙靖》,卷二一二又有《李熙靖》,二者实为一人。赵翼所提出的种种观点,不乏真知灼见,往往为史学评论者所采纳。

钱大昕是一位十分严谨的学者,他在历史考证中重证据、求精审,发现并纠正了《宋史》内容中存在的大量错误,对其中存在的体例问题